

新媒介视域下的“取消文化”及其反思

郑根成

(浙江工商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 浙江 杭州 310018)

[摘要] 最近几年,一种取消文化在美欧乃至亚洲一些国家日渐风行,并对当代社会文化与生活产生了较大影响。在对待取消文化的态度方面,有支持者亦有反对者。支持取消文化的自由派人士把取消文化解读为弱势群体的武器,认为它让普通公众有机会在媒介空间中表达自己对那些带有歧视或不公平含义之言论的态度与立场;而反对取消文化的群体,特别是部分社会精英阶层的人士则认为取消文化已经异化为一种群体性羞辱,它不仅妨碍了人们的自由,而且还助长了暴戾的社会气氛。从新媒介的视角看,取消文化既代表了新媒介时代无中心传播模式下公众表达的新趋势,又反映了新媒介时代网络空间祛虚拟化的文化趋向与特点。其内在的逻辑表明,新媒介技术是型构文化的积极力量,它的产生和发展总是与特定的文化形成和发展有着密切的联系。在当下的新媒介时代,取消文化的迅速发展隐藏了取消文化扩大化与极端化态势下的隐私公然被侵犯、人肉搜索及与之相伴的网暴风险与危机。

[关键词] 取消文化 新媒介 隐私侵犯 祛虚拟化

一、取消文化及其缘起

近年来,一种被称为“取消文化”的活动日渐为人们所熟知。这一活动首先风行于美国,随后逐渐蔓延到欧洲与亚洲的一些国家。所谓“取消文化”,指通常处于弱势的社会公众通过线上、线下或线上与线下相结合的群体行动方式,抵制、抗议某些有违法、悖德行为的社会公众人物,从而弱化甚至完全解除其社会影响力,进而导致涉事者丧失工作与商业代言机会的活动所衍生的文化现象。在取消文化中,某些明星、名人等公众人物之所以被“取消”,有的是因为他们与社会公众在价值观、文化立场上存有较为严重的分歧,有的是因为其道德问题甚至违法行为而被视为有“污点”的人。广义的取消文化不仅限于取消明星、名人的商业代言、工作等机会,还包括了抵制、抗议危害社会的公司或企业,导致其业务萎缩甚至最终破产,等等。

关于取消文化的起源,各界的意见并不一致,主要的看法有:

1. 源于社交媒体中公众人物与粉丝的互动。主要是指粉丝在公共与私人媒介空间以社交帖子曝光公众人物的不当作为信息,转而由拥趸变为反对者,并采取线上的“取关”与线下的抵制、声讨等,其结果就是公众人物流量流失、受关注度下降以至于商业代言机会被削减甚至完全丧失。如果公众人物涉嫌与违法、犯罪行为有牵连,则相关的取消文化活动可能促推相关社会监督部门、机构的介入。有人认为,2014 年,苏伊·帕克发起的抵制斯蒂芬·科尔伯特晚间秀活动是最早突出使用“取消”的活动之一^①。但是,在这场取消文化活动中,取消的对象并不是具体的个人,而是科尔伯特主持的脱口秀节目。随后,取消文化活动才逐渐转向专门针对社会名流,特别是演艺界人士。2019 年,美国公众因詹姆斯·查尔斯评判其他名人的不当作为而发起了一场取消文化活动。在这场取消文化活动中,取消文化才真正成为有着清晰文化自觉的社会活动,关于取消文化的语言也自此趋于成熟。

[基金项目] 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媒介史视阈下的人工智能伦理研究”(21BZX116)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 郑根成,浙江工商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哲学博士,研究方向:应用伦理学。

① 斯蒂芬·科尔伯特是一名喜剧演员,他曾主持一档名为《科尔伯特晚间秀》的深夜脱口秀节目。针对这一节目的取消活动是由苏伊·帕克等人发起的,起因是科尔伯特在关于美国“华盛顿红人橄榄球队”以及亚裔美国人的新闻报道分析中涉嫌种族歧视。

在当下的新媒体空间中,粉丝团文化是取消文化得以快速发展的重要原因之一:粉丝团可以助力宣传社会公众人物,快速提升其社会关注度;但是,粉丝团同样也能快速地弱化社会公众人物的影响,迅速弱化其商业价值。一方面是因为基于新媒体技术的媒体平台或自媒体空间为粉丝团提供了极为便利的表达通道,另一方面,更为重要的是,粉丝团的人数众多,一旦形成一致性意见,就会借助新媒体平台迅速发酵,促进某种社会舆论的形成。对于社会公众人物,特别是演艺界明星来说,粉丝在新媒介空间中发起的取消文化具有极强的杀伤力,他们会因此在短时间内失去大量粉丝及其关注度,而粉丝与关注度直接关系到他们的社会影响力与商业价值。近年来,美国的一大批公众人物都曾被取消过,取消文化造成的印象似乎是所有人都可能会因为其生活中的某件事情而被取消,在某种意义上,这表征了社交媒体上粉丝和名人文化的浮躁、琐碎和戏剧化。在这个意义上,取消文化并不代表文化发展的积极方向。

2.源于黑人的社交方式。2021年5月,美国VOX网站曾刊载一篇关于取消文化的文章,文章称“取消文化”概念大约在2013年后才逐渐进入到社会的主流舆论^①。伊娃认为,在美国的黑人社会中,取消文化其实是一种“常态化”的存在,甚至是黑人社会中的一种社交传统^②。取消文化在美国的发展证实了伊娃观点的可接受性:最初,取消活动仅限于黑人社会中的文艺领域,特别是电视与广播节目中。1981年,尼尔·罗杰斯创作歌曲《你的爱被取消》,最初,这首歌并没有引起广泛的关注,直到1991年,编剧巴里·迈克·库珀在编写《新杰克城》的电视剧本时,一家电台正在播放《你的爱被取消》这首歌,阿贾·罗马诺在后来的采访中把这个节点视为“取消”概念在电子媒介上的首次出现。罗马诺的考察显然不准确,但他刊发的相关评论却使得取消文化由此进入公众视野。1991年的美国电影《纽约黑街》与《爱与嘻哈:纽约》进一步推动取消文化进入社交媒体,成为广为人知的文化形式;2014年以后,随着非裔用户在推特中掀起大量与取消文化相关的活动,取消活动进而在新媒介平台(主要是推特)以及某些在线社会正义运动的支持下,成为反对种族歧视与社会不公的文化形式。同时,取消文化也逐渐走出线下黑人社区,走向黑人的线上空间,与其他族群的在线空间相结合,线上与线下相结合,并在互联网的推动下迅速走出美国,走向世界,特别是欧洲与亚洲的一些国家,澳大利亚、加拿大以及非洲的尼日利亚等国家的取消文化活动也有所发展。黑人社交传统的取消文化史考察表明:取消文化与社会弱势群体,特别是黑人群体的文化自救行为有着密切的关联,它源于这些群体自发组织的旨在表达对种族歧视、偏见,乃至暴力行为的不满、愤怒但又无力改变的无辜与无奈。其目的则在于试图通过抵制与抗议等形式提请社会关注针对他们的社会不公,促进相关政府职能部门出台积极干预。

3.文化史溯源。美国学者姬尔·迈克考克尔认为,“取消文化”其实在电子媒介时代之前就已经存在了,甚至可以说,它贯穿了整个人类历史。千百年来,人类社会一直有惩罚违反相关社会规则者的传统^③。当下流行的“取消文化”,不过是传统“取消文化”结合了数字技术与娱乐文化等多方面要素的当代形态。也有人把历史上的“封杀”解读为取消文化的历史形态,但实际上,历史上的封杀与文化取消是有区别的:“封杀”是指国家公权力针对个体及某些社会群体,或强势群体对社会弱势群体的权力伸张、人身自由、信息获取等方面的全面限制;而当代取消文化则多是指处于弱势的个体或公众对处于强势的名人、明星、政府公务员等公众人物的不当言行进行抗议或抵制。故此,把历史上的封杀解读为一种文化取消是值得商榷的。范妮莎·贝斯利则认为在美国建国之时,取消文化就已经存在了,发展到今天,取消文化已经成为一种“流行的让对手闭嘴的社交媒体消遣”^④。贝斯利研究的意义更多地在于说明了取消文化起源于美国,这从取消文化传播到欧洲以后的反应也可可见其端

① <https://www.vox.com/culture/2019/12/30/20879720/what-is-cancel-culture-explained-history-debate>.

② Ng, Eve. "No grand pronouncements here...: Reflections on cancel culture and digital media participation", *Television & New Media*, 2020, 21(6), pp.621-627.

③ Alan Dershowitz, "Cancel Culture: The Latest Attack on Free Speech and Due Process", *Hot Books*, 2020, pp.88-90.

④ Vanessa Beasley, "Fixing the American Politics", *Routledge*, N.Y. 2021, p.8.

倪:取消文化传播到欧洲以后,欧洲文化界对待取消文化的态度比较谨慎,相较于美国社会聚焦于种族歧视的取消文化活动,欧洲文化界则更担心取消文化会将社会问题种族化。这一立场在法国、英国表现得更为明显,英法两国的一些学者甚至自发地组织起来抵制来自美国的取消文化;法国总统马克龙、英国前首相约翰逊与教育大臣加文·威廉姆森等人还现身说法,呼吁人们警惕美国取消文化的消极方面,他们所担心的是美国过于意识形态化的文化会对本国社会造成颠覆性影响。

大数据检索表明,取消文化最早进入谷歌搜索词库是在2017年11月。在*Urban Dictionary*中,取消文化则首先出现于2018年3月。张拓木对“取消文化”作了相关的资料梳理,他认为,“取消文化”一词首次出现于乔纳·恩格尔·布罗姆维奇发表于《纽约时报》的《所有人都被取消了》一文中^①。2020年,曾一度引起世界广泛关注的乔治·弗洛伊德被警察跪杀事件引发了一场席卷全美国的“黑命攸关运动”,事件中,所有美国人都在反思该事件背后美国历史上的种族歧视与社会不公等问题。随后的《哈泼斯公开信》^②更是激起了一场大讨论,取消文化也由是成火热之势席卷美国,随后又蔓延至欧洲,成为欧美知识界热议的公共议题。

近年来,“取消文化”在欧美国家愈演愈烈,大型的社会事件有“Me too运动”“黑命攸关运动”以及一些涉及性别与种族议题影视剧下架风波等等。较为典型的个体事件则有好莱坞演员凯文·史派西于2017年因涉嫌性侵丑闻而被取消;著名作家J.K.罗琳公开发表恐同言论,称“有月经的人才不是女性”,大量公众认为这是针对跨性别人士的歧视性言行,罗琳因此遭到粉丝与《哈利·波特》电影演员的强烈抵制乃至被取消;等等。在我国,近些年也爆发了许多取消活动,最典型的有针对吴亦凡、郑爽、张哲翰、李易峰等失德艺人的取消活动。尤为值得关注的是,我国相关政府职能部门不断加强对文娱明星行为的指导与监管,并加强了对违法、失德艺人的惩治,这意味着我国的取消文化还有其特别的公共职能,这代表了取消文化发展的一个有建设性价值的方向。

二、关于取消文化的争论

当下的取消文化在欧美国家乃至亚洲一些国家愈演愈烈,已经在文化建构的维度上对社会的各个方面、各个层面都产生了较为深刻的影响。同时,围绕取消文化的争歧也日趋激烈,争论各方各执一端,几成水火之势。

其一,自由派人士倾向于把“取消文化”视为弱势群体的强有力“武器”,认为取消文化让民众有机会在媒介空间中表达自己对那些带有歧视或不公平含义言论的态度与立场。他们甚至认为取消文化已经成长为社会正义的重要工具,更为重要的是,它通过特定的身份与价值认同建构机制实现了处于弱势的少数裔群体的组织化。以萨拉·杰克逊为代表的一些学者认为取消文化代表了一种社会文化进步,因为,在web2.0技术时代之前,很多不能在公共平台发声的人,如今都可以借助新媒体技术在各种媒介平台上自主发声了。这既表明了技术的进步,还表明了人们观念表达欲望与能力方面的成长^③。还有人认为,在取消文化活动中,少数裔群体通过取消活动来表达对精英阶层不当言论的愤怒并进行抵制,其本身就体现了一种言论自由。取消文化活动中,弱化甚至取消某些历史人物的影响代表了人们对自身处境自觉反思,以及改变社会不平等、不合理现象的强烈意愿。因为,“取消文化”让更多人意识到了曾经没有被察觉的偏见和歧视,而在取消活动中,各行业、各领域曾经

① Jonah Engel Bromwich, *Everyone Is Canceled* [2023-03-06] (2018-06-28), <https://www.nytimes.com/2018/06/28/style/is-it-canceled.html>.

② 《哈泼斯公开信》: A Letter on Justice and Open Debate. *Harper's Magazine*. July 7, 2020. 153名艺术家、作家和学者在公开信上签名。公开信发表之前,反种族歧视运动在全国已成蔓延之势,越来越多的公众人物也都参与到了呼吁改变少数族裔的社会不公待遇,并表示要为改变由白人主导艺术和学术机构的现状而做出自己的努力。但《一封关于公正与公开辩论的信》却认为美国当下的反种族歧视活动走过头了,并导致了一种“不宽容的社会氛围”的蔓延。有评论家认为,这封信代表了当代美国的群体对其话语权受到冲击甚至威胁的担忧,并表达了对取消文化的抵制态度。

③ S. J. Jackson, "Making BlackLivesMatter in the Shadow of Selma: Collective Memory and Racial Justice Activism in U.S. News", *Communication, Culture and Critique*, 2021, 14(3), pp. 385-404.

独掌话语大权的人看到了普通公众的话语表达,体验到公众话语表达的威力,这让他们更加重视平等观念,客观上提升了少数族裔、女性和性少数群体的社会地位。取消文化是一种价值共同体建构的方式。姬尔·迈克考克尔认为,处于弱势的少数裔群体在互联网上采取的集体“取消”某个对象的行动能营造出一种“患难与共”的氛围,因为,在群体性的取消文化活动的参与中,人们能真切地体会到自己是某个特定群体的一部分,“感觉自己是比你自身更大的事物中的一部分”^①。在美国的政治分裂时代,特别是特朗普以来的政治分裂时代中,取消文化活动建构了一种群体的团结感,这赋予取消文化以一种时代使命担当的形象。

其二,反对取消文化的人主要针对当下取消文化的过度泛滥及其极端化倾向,认为取消已经成为一种群体性羞辱,它不仅严重妨碍了人们的自由,而且还助长了社会的暴戾气氛。(1)取消文化是一种加强版的政治正确^②。埃里克·施安伯格认为,取消文化是一种加强版的政治正确,它借助公共政策、社会污名和经济后果的“强大组合”促成目的的实现,并在舆论的氛围中迫使人们以政治正确的立场对待某些特定的议题,施安伯格因此宣称“取消文化”是个大问题,其本身应该被“取消”^③。由于在取消文化活动中存在对待不同意见的人进行各种攻击的现象,有的保守派人士把取消文化解读为一种“骚扰”甚至是“暴民政治”。有人还就此声称取消文化的这种攻击迫使让公民沉默,违反了思想和言论自由的原则,甚至已经对自由社会赖以生存的信息与理念的自由交流产生了威胁。在2021年3月份的一份调查中,有高达64%的美国人都认为取消文化威胁了自由。在这种解读思路中,取消文化已经促成了某种形式的大规模“文化战争”,并有日益扩大化的趋向。(2)取消文化促成了不宽容甚至是暴戾的社会氛围。这种观点多源出于西方社会的精英阶层,《西班牙日报》的一篇文章称,一大批社会精英看到了“取消文化”的危害,认为取消文化已经发展成为一种群体羞辱式的排斥行动,并表现出了对反对意见的不容忍。签署《哈泼斯公开信》的史蒂芬·平克、福山、乔姆斯基、阿特伍德、罗琳等人也表达了对取消文化活动的深层担忧,他们认为,取消文化已经失控,成为一种毫无意义的社交媒体暴民统治形式。这种文化助长了一种敌我对立式的战斗风气,一些人会因为害怕被取消而不太敢说内心真实的想法,另一些人则可能出于对取消的愤怒加剧了对进步派的厌恶,其结果就是中间地带愈发单薄,社会言论在两极化的道路上越走越远,保守的越来越保守,激进的越来越激进。平克、福山等人也认为,取消文化甚至已经成了阻碍思想自由交流的因素,助长了公共话语中越来越多的不宽容气氛,他们认为取消文化“往往会削弱我们的公开辩论准则和对差异的容忍,而有利于意识形态的顺从”^④。

三、取消文化的新媒介进路

当下的取消文化发展与新媒介技术有着密切的关联,一方面,新媒介为取消文化活动提供了便利的平台与通道,取消文化活动得以酝酿成具有重大社会影响的文化事件,也正是借助了新媒介平台与通道,取消文化才快速地由美国蔓延至欧洲及亚洲的一些国家;另一方面,新媒介还赋予取消文化活动以许多独特的新媒介特点,并在某种程度上影响了取消文化的发展方向。

1. 新媒介传播模式转型与取消文化

新媒介技术与新媒介平台是当下取消文化得以迅速火热起来的原始土壤。一方面,新媒介空间

① Jill MacCorkle, "Cuss Time: By limiting freedom of expression, we take away thoughts and ideas before they have the opportunity to hatch", *The American Scholar*, 2008, 77(1), pp. 59-62.

② 所谓政治正确是一种基于爱德华·萨丕尔和本杰明·李·沃尔夫两人提出的语言影响力理论的理论,萨丕尔和沃尔夫两人最早明确提出,通常用来描述人群的语言是有影响力的。而政治正确则指在评价社会弱势群体或解决与弱势群体相关的问题时,尽可能做到态度公正,避免使用冒犯及歧视的词语或语气。此外,在观点、立场的表达,政策和行为实施中保持公正、公平也是“政治正确”的表现。政治正确兴起于20世纪80年代的美国,并演绎成为保守派贬抑激进派的一种话术。取消文化与政治正确之间有着某种相似性,故有些人将取消文化视为新版的甚至是加强版的政治正确。

③ 转引自侯健羽、青木、纪双城等《谁成了“被取消对象”?“取消文化”在欧美引发两极辩论》(2021-07-17)[2023-05-21], <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702765505937908769&wfr=spider&for=pc>.

④ <https://slate.com/news-and-politics/2020/07/harpers-letter-reality-debate.html>.

中,人们聚集于QQ群、微信群、微博圈、贴吧等各大媒介平台之中,这些媒介平台已经不再只是信息流通的通道或工具,而是成长为人们进行社会交往、参与社会治理、进行信息传播等活动的基础平台。从信息传播的角度看,信息在各个媒介圈落中的病毒式传播使得取消信息能在极短的时间内引起社会的广泛关注,其速度之快超过了以往任何时期的信息传播。另一方面,媒介圈落中的信息传播极易唤起“同情”^①。因为媒介圈落(微信群、QQ群、微博圈等)建构的最基本法则不是血缘或地缘,而是业缘或趣缘,也就是说,同一媒介圈落中的人们大多是基于共同的兴趣、价值偏好或工作关系,同一个媒介圈落的人们大多更容易在同一问题唤起“同情”。随着取消文化活动的不断发展,如今,取消文化越来越频繁地走向线上与线下相结合的形式,其社会影响也因此越来越大。实际上,所有的取消文化发展的基本路径都基本相同(图1),一旦公众人物、企业或公司的违法或悖德行为被曝光,人们就会发起线上、线下或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抵制、抗议活动。在当下的新媒介时代,这种活动往往具有几个基本特点:一是新媒介时代的传播在各个媒介圈落中交叉传播,由此导致社会反响非常快;二是信息通道的便捷性时常会将事件引向纵深的背景,事件的全貌在短时间内就能被“人肉”出来;三是新媒介传播机制下,事件在短时间内的集中曝光以及各种非理性声音的参与,时常会放大事件的社会效应。从图1可以看出,针对个体、企业或公司的文化取消并不是一个单向的过程,而是一个多向的过程,即过程中的任何一个环节都可能直接导向社会舆论浪潮的针对性取消活动或来自相关政府职能部门的惩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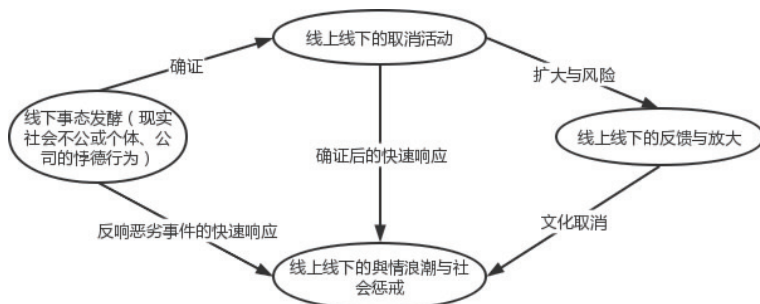


图1 取消文化的新媒介路径

从传播模式的角度看,取消文化的兴起其实代表了新媒介时代传播方式由“自上而下的、一对多的‘中心-边缘’结构”向“分布式的、多对多的‘处处是中心,无处是中心’的无中心结构”的转型^②。在传统的大众传播时代,文化精英是信息传播者,他们是传播的主导与中心。因为,在当时的技术条件下,只有社会精英人士才有媒介接近权,也只有他们才具备较强的思想能力与表达能力,从而能系统地阐述社会文化的基本进路及其意义,并制定系统而有效的规范与管理机制。而作为受众的普通公众既没有媒介接近权,也没有相应的话语能力与表达通道。这种传播模式是典型的“传受二分”模式,即社会精英阶层作为传播者居于传播生态的中心,而普通公众作为信息接受者则分布于传播者周围,所有的信息传播都是单向的(图2)。然而,到了当下的新媒介时代,普通公众也借助新



图2 大众传播时代单向的“一对多”的“中心—边缘”传播结构

① 李静:《微信青年用户的社会比较活动与社交媒体倦怠研究》,《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22年第4期。

② 关于新媒介传播的“处处是中心,无处是中心”的“无中心结构”传播方式及其论证,可参见拙文《社会热点事件的新媒介化机制研究》,《贵州社会科学》2018年第7期。

媒介技术获得了媒介接近权,并能通过新媒介平台表达自己的意见。在这里,他们不再是被动的信息接受者——受众,而成为在新媒介技术支持下的“创众”。根据阿尔温·托夫勒的解读,“创众既是生产者,也是消费者,他们跟过去的‘观众’和‘受众’最显著的不同,是他们有技术条件参与不同程度和形式的媒介制作,由合成数码照片到恶搞主流媒体影视作品,都是创众可能做出的富有创造性的文化和社会实践”^①。阿尔温·托夫勒的《第三次浪潮》发表于 20 世纪 80 年代,当时,网络技术尚未普及,人们能借助网络创作的产品还极其有限。但是,托夫勒却睿智地预见到了网络技术发展的未来趋势。新媒介时代,创众所能创作的作品远远超出了托夫勒所开具的清单,他们不仅可以发起话题讨论,而且可以制作视频、音频文件并自主上传,甚至可以在媒介空间中开发自己的小程序或平台,等等。取消文化正是这样一种新媒介时代的文化活动,一方面,普通公众在新媒介技术的加持下获得了媒介接近权,曾经被动的受众能快速地对悖离社会伦理、道德的行为表达自己的看法,并在网络“圈落”的交叉传播中放大自己的声音,强化自己的价值立场。另一方面,普通公众在作为公共领域的互联网的崛起意味着传统社会精英阶层的话语垄断权被消解,普通公众实现了自下而上地发起针对社会精英阶层的反讽、批判甚至社会取消(图 3)。在现实中,取消文化大多会从线上蔓延至线下,形成强势的社会舆论,以至于最后推动政府职能部门作出相应的惩戒性措施。在这种情况下,取消文化活动似乎又成了监督与治理的补充性资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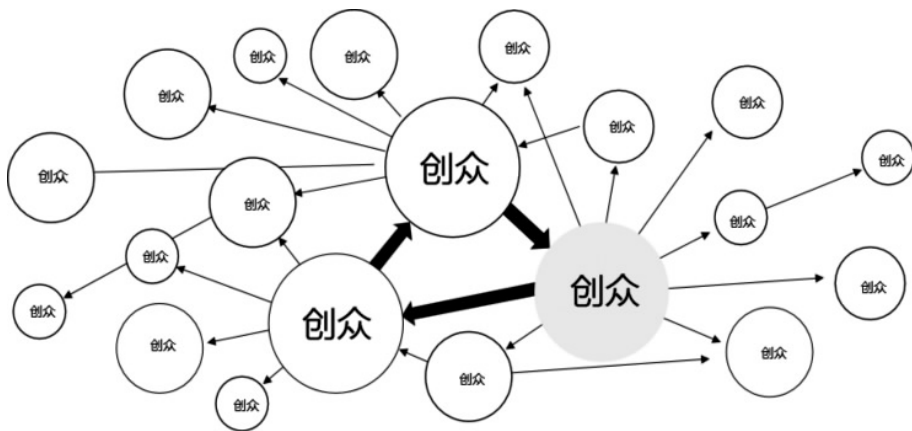


图 3 新媒介时代多对多态势下的无中心传播结构

2. 网络空间的祛虚拟化与取消文化的现实意义

当下的网络空间是由基于 web2.0 以来的数字技术、大数据平台、三网融合以及移动终端等技术的新媒介空间。它从最初的万维网进化而来,在空间性质上,互联网空间的性质已然改变:网络空间一度被人们解读为独立于人们现实生活之外的虚拟空间。一般来说,当人们提到虚拟空间时,他们大多指在以 web1.0 技术为基础的万维网时代,由程序员们借助计算机硬件,用符码建构起来的、区别于现实物理生活空间的网络空间。“虚拟”乃是相对于“现实”而言的,在虚拟的万维网空间出现以前,人的存在直接指向现实的人及其活动,除此之外,人们无法体验“人”在其它场域的存在或发展。这种具有直接感知性的场域既是人们曾经的存在与发展的基础,也决定了人的发展可能——不论人们是否意识到这一点——人类的存在与发展是基于既有的自然环境与社会关系,超出这一自然环境与社会关系的存在、发展是人们无法把握的,也不具有现实性。而虚拟空间则是一个区别于现实生活空间的虚拟化环境,不仅其环境是虚拟的、不可直接感知的场域,活动于其中的人本身也是被遮蔽了真实面目的存在。正因为这样,人们还倾向于把虚拟的 web1.0 空间看成是一个“另类空间”

^① Toffler, A (1980). *The Third Wave*. New York: Morrow, 转引自邱林川、陈韬文《新媒体事件研究》,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 年,第 20 页。

或“非常态空间”。

随着技术的发展,web2.0已经取代了web1.0,网络也由万维网发展到当下的互联网。区别于万维网空间的是,互联网空间的虚拟性日趋弱化,日渐朝着与现实生活空间高度趋同的方向发展。在这一趋势下,当下的互联网不再只是简单的信息工具或平台,在各种新媒介技术的支持下,互联网已经成为人们参与公共事务、打理个人社交、交流情感的主体平台与空间。这即是说,互联网这一新媒介所建构的不仅是新的信息传播方式,还“使得人类逐渐结合为一体,重新‘部落化’”^①,即它还建构了一种全新的生活方式与社会文化方式。互联网甚至对经济格局都产生了重大影响:“互联网对个人生活方式的影响进一步深化……互联网正逐步发展成为我国社会经济民生生活的基础设施……从现象看,互联网平台已形成巨大经济规模,展现了极强的拉动就业的能力,促进了共享经济的蓬勃发展,对经济格局产生重大影响”^②。在这个意义上,互联网空间不再是独立于人们现实生活之外的空间,同样,发生在媒介空间的媒介事件也不再是独立于我们日常生活之外的由他人策划并向我们发布的事件,新媒介事件本身就是作为人们日常生活的重要部分,它所代表的是人们线下活动的线上化,是日常在线上的延续。互联网空间与现实生活空间的趋同化解构了网络空间虚拟性,促成并不断强化社会媒介化的浪潮。

取消文化极为动态地演绎了网络空间与现实生活空间高度趋同化的趋势与特点,并反映了当代社会文化与社会治理的新方向与新趋势。不论是起源于线下的取消文化,还是起源于线上的取消文化,最终都必定走向线上与线下的混合模式:线上的意义表达与舆论浪潮最终会推动相关职能部门出台相关治理措施,线下(现实生活空间)的反应与实际措施的推出又会引导线上、线下的舆论走向,同时,线下、线上舆论动态又建构全新的社会伦理价值的认同方式与社会治理的新进路。社会伦理价值认同方面,人们不再基于社会精英的价值权威来确立自己的价值立场、原则与目标,普通公众也能在新媒介空间中各种自媒体平台的互动与分享中促进社会舆论的形成。在这个过程中,新媒介空间成为人们价值认知与互动、交流的最便捷平台。从当下的取消文化态势看,线上的取消文化活动呈现了一种全新的社会组织与社会动员方式以及新的社会团结方式:人们在自己的媒介圈落中与兴趣相近、价值取向趋同的人们交流与互动,这种交流与互动超越了个体的现实生活空间,进而重塑了人们之间的边界感。这完全颠覆了人们对人际边界的传统认知,也型构了新的社群与相应的文化互动方式。可以说,线上线下的同步性与一致性已经成为新媒介时代取消文化的一大特点——线下的取消活动会同步移位至线上并在线上被迅速放大,线上取消活动的效果会同步至线下并产生持续与广泛的社会影响。在这里,曾经的独立于现实物理生活空间的“虚拟空间”日益与现实物理生活空间与文化空间呈现出高度趋同的特点。

四、取消文化的启示与反思

其一,新媒介是一种型塑文化的积极力量。在媒介技术与文化型塑的关系问题上,媒介环境学派的大师们一致认为,任何技术的形成与发展都意味着某种特定的新的文化环境得以形成并将持续影响人们的生活。哈罗德·伊尼斯就认为,一种新媒介的长处就在于会促推一种新文明的产生^③。伊尼斯的这一思想在麦克卢汉及后来的媒介环境学派学者们的研究中被反复提及,在麦克卢汉看来,媒介本身比媒介所传输的信息更值得关注,因为,媒介及其所传输的信息会使人们深深地卷入其所从事的活动之中,不仅如此,而且,“任何技术都逐渐创造出一种全新的人的环境,环境并非消极的包装用品,而是积极的作用进程”^④。在这里,麦克卢汉从一个超越了传统大众传播媒体的角度解读了媒介技术的文化意义。林文刚对这一解读技术的文化进路深表认同:“北美的环境学建构了一个

① 张龔、徐嘉鑫:《数字时代通信权的重释》,《齐鲁学刊》2022年第5期。

② 唐绪军:《中国新媒体发展报告(2016)》,北京:社会生活文献出版社,2016年,第2-3页。

③ 哈罗德·伊尼斯:《传播的偏向》,何道宽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28页。

④ [加]马歇尔·麦克卢汉:《理解媒介——论人的延伸》,何道宽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年,第25页。

富有想象的理论空间,它把人们引向综合性思考的层面,探究媒介如何影响我们所处的世界并成为其中的一部分,如何渗透到世界的各个角落,影响我们个人和集体的生活方式。”^①媒介环境学派由是确立了一个关于技术与文化的基本立场:新媒体凭借其对文化的深层作用突破了狭隘的“媒体”领域,将其影响施加于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从媒介环境学派的角度来分析当下取消文化,取消文化与新媒体技术的关系就一目了然:取消文化是新媒体技术的产物,它是一种人们借助互联网、大数据、移动终端等新媒体技术以及微信、QQ、微博等自媒体群组表达自我价值趣向与行动取向的文化现象。作为一种与新媒体技术“联姻”的文化现象,取消文化的发展与新媒体技术发展具有某种程度的同向性:新媒体技术发展不但会助力取消文化的发展,而且还会强化取消文化的方向。从当下的态势看,基于互联网、大数据、移动终端等技术深度融合的新媒介技术在社会文化的型塑作用超出了以往的任何历史时期。故而,在可预见的未来,如何对待取消文化问题的核心是理性地处理我们所面临的已经存在和可能到来的问题,而不是简单地压制或取消之。从文化史的角度看,“取消文化”又不全然是新生的文化现象,在人类历史上,取消文化一直以某种形式存在着。然而,作为新媒体技术的产物,新媒体赋予了取消文化新的特点:(1)在早期的取消文化中,取消行动更多地是一种个体的自发行为,它多出个体对其不认同的人或事加以抵制乃至惩治或报复。一般来说,在个体间联通渠道受限的情况下,早期的取消活动都很难形成大规模的社会性活动。然而,当下新媒介境遇下的取消行动则借助线上、线下联通与互动的便利机制,快速地形成有重大影响的大型群体性活动,成为一个群体针对另一个群体或某些个体的抵制活动。(2)随着时间的推移,取消文化日渐走向极端化,其惩罚意味也不断加强,被取消的对象也不再限于明星、名人等公众人物,一些普通公众有时也会成为被取消的对象;同时,取消文化的社会后果也越来越严厉,作品下架、从已经发布的作品中除名、直接中断其事业前途等严厉的取消后果也时有所见。(3)取消文化活动中,被取消的人并不限于当下现实生活中的人,还包括了历史人物,这主要针对历史上的负面形象人物,这些人要么品行低下,要么是与历史进步潮流相对立的反派人物,针对他们的取消文化主要是减少甚至消除其在当下社会中的文化、价值层面的影响。但是,从文化史的角度看,历史人物及其作为都是特定时代的产物,以现在的价值立场与技术手段来审判并进而取消之,其所代表的是其实是一种非理性的价值冲动,是不可取的。

其二,取消文化的扩大化及其影响。互联网是当下新媒介的基础平台,其核心要旨在于实现了信息、人、社会环境间的互联互通。从社会交往的角度看,作为新媒介的互联网的最大特点在于其开放性、大众性与信息的全面性。这里的开放性与大众性意味着互联网的进入门槛大幅降低,新媒介空间不再是那些受过系统教育的社会精英所独占的话语平台,所有能操作网络终端(包括智能手机、平板电脑与台式电脑等)的人都能相对自由地在新媒介平台或其自媒体空间中发起话题,只要这个话题具备足够的爆炸性或相应的社会影响力,话题的发布者及其自媒体空间就会成为社会关注的中心,而话题所涉及的事件也就会迅速成为社会热点事件。所谓信息的全面性,主要指在当下的互联网时代,人们能从任何一个细小的信息节点连通至其他信息节点。与新媒介空间的开放性、大众性和全面性相关的是,取消文化极易走向扩大化与极端化的歧途。取消文化的扩大化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主体的扩大化。一般来说,取消文化是针对某个人或某个群体的悖德行为,在起初的取消活动中,人们也大多主要针对特定个体或群体的悖德行为;然而,随着取消活动的发展,许多普通公众及其行为也会在社交媒体上受到群体谴责,但其问题并不涉及犯罪或造成严重的人身伤害,甚至一些同情社会正义事业的评论员及当事人的亲属、朋友等也会成为取消的对象。二是取消面的扩大化,这主要是指取消活动有时会发生由点及面扩大化的趋势。2021年,美国科罗拉多州政府拟更改红石公园、内格罗台地等20多处自然景观的名称,因为这些名称涉及种族歧视——红石公园的红皮肤涉嫌蔑视北美印第安人,而内格罗地则因其与“黑人”一词重名而涉嫌对黑人的歧视。但是,随着

① [美]林文刚:《媒介环境学》,何道宽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30、193页。

活动的开展,许多不甚相关的人、文艺作品等都受到波及,美国总统托马斯·威尔逊、西奥多·罗斯福等的雕像、电影作品《乱世佳人》、文学作品《哈克·贝利·芬》等都成了取消的对象。事实上,美国的这场取消文化活动已经逐渐蔓延成了一场近乎泛滥的活动——到2021年12月,美国有近千处地名或纪念碑都面临被强行更名甚至拆除的命运。取消文化活动的扩大化必定导致极端化,即当某个人因为某种行为或某件事情而被取消时,取消攻击的范围时常会涉及他的所有行为和生活的所有方面。在这种情况下,取消文化表现出极端的非理性及对边界的突破。其中潜藏了一系列的风险与危机:(1)隐私被侵犯的风险与危机。新媒介时代,信息的可达性、快速化及基于大数据的信息分析与综合能力等都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但这种信息的可达性以及基于大数据的信息分析与综合能力同时也意味着个人隐私信息散布在各媒介平台中,当某个人成为取消活动的对象时,活动的发起人或参与者能轻易收集其相关信息,并成为强化取消活动的因素。(2)与隐私信息大量暴露相伴的是人肉搜索及其由人肉搜索所引发的网络暴力。毫无疑问,人肉搜索介入人们的生活是一种暴力,“首先,有针对性的人肉行为介入人们的生活从来就不征求同意;其次,一旦个人信息被暴力搜索并被公开,这种暴力对相关者的影响就不只局限于网络社区,还会在现实生活中给人们带来巨大的困扰,网络暴力由此演变成为现实的暴力。更为可怕的是,在缺乏有效约制的情况下,现实的人们随时都处于被‘人肉’的暴力与恐吓之下”^①。由此所导致的问题是既极大地削弱了人们在现实生活中的安全感,又极大地伤害了人际间的相互信任。在现实生活中,由于担心信息安全问题,人们会越来越倾向于消极地保护自己的个人信息,尽管在当下的新媒介时代,完全隐藏自己的隐私信息已经变得越来越不现实,当人们尽可能地把自已封闭在一个相对自认为私密的境遇中时,现实的价值共同体建构就会变得越来越艰难。

(责任编辑 刘 英)

^① 参见郑根成《人肉搜索的伦理反思》,《道德与文明》2010年第5期。